

国际问题研究

差异性一体化原则和 有秩序的多元主义

——简论贝克的世界主义理论

杨 深

【提 要】当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阐述了“反思的现代化”、“世界风险社会”和“世界主义”的理论。贝克指出,随着第一次现代性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等基础体制被第二次现代性社会或曰反思的现代性社会所补充和取代,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不仅形成了一个风雨同舟的利益共同体,而且变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风险共同体。正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加强和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使世界主义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世界主义在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差异或“他性”的问题上坚持“差异性一体化”原则,世界主义的目标就是构建一种兼顾差异和一体化的“有秩序的多元主义”社会。

【关键词】世界主义 差异性一体化 有秩序的多元主义 国际宪法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4-0123-08

在西方,与中世纪晚期以后才兴起的国家主义思想和国家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不同,世界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可以说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他们明确表达了贬低单个国家(城邦),推崇世界国家,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的观点。古罗马思想家对万民法的肯定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中世纪的但丁则提出了“世界帝国”和世界和平的思想。在近代,卢梭主张通过建立欧洲邦联,达到消灭战争、实现欧洲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提出的著名设想则是,通过所有的国家都成为共和制、世界范围内的法治和各国的契约,来达到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目标。马克思也在批判阶级国家的基础上,做出了未来国家消亡的预言。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联手建立了第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正式成立并且逐步发展成为几乎囊括全球所有国家的普遍性国际组织。这些都是在国际政治实践层面上向着世界主义方向的进展。然而,真正具有世界主义意义的政治实践的发展却是欧洲联盟的建立。

二战结束后,饱受战争摧残的西欧丧失了世界的主导地位,对于战争的灾难性后果的反思以及在冷战中对抗苏联集团的需要,促使西欧各国逐渐走上了国家联合的方向,从欧洲煤钢联营集团发展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直至建立起欧洲联盟。随着欧盟的建立和发展,在西欧盛行了数百年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逐渐淡化,

同时,面对全球性问题和危机的日益严重化以及“世界风险社会”的形成,西欧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世界主义思潮,与美国追求霸权和单边主义的取向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也是双方在国际地位、历史渊源和现实利益等方面的差异所使然。这种世界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包括于尔根·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乌尔里希·贝克等人,他们各自或共同提出了一些世界主义的设想,其中最为典型的理论是乌尔里希·贝克的世界主义构想。

一、反思的现代化和全球风险社会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1944~)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他长期从事社会发展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概念,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堪称卓有建树的全球化理论专家。他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和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共同提出了“第二次现代化”或“反思的现代化”的概念,力图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他还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和奠基者,并努力在社会学的框架内分析“世界主义”的矛盾和动力,因此成为当代西方世界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家。其主要著作有:《风险社会》(1986)、《解毒剂:有组织的不负责任》(1988)、《生态启蒙》(1992)、《反思性现代化》(1994)、《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1995)、《重塑政治:全球社会秩序下的反思性现代化》(1996)、《世界风险社会》(1998)、《什么是全球化》(1999)、《风险社会及其超越》(2000)、《个体化:制度化的个人主义及其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2002)、《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2004)、《世界主义的欧洲:第二次现代性的社会与政治》(2004)、《全球时代的权利》(2005)、《世界主义视野》(2006),等等。

贝克的社会学理论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反思的现代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和

“世界主义”的构想。在贝克看来,现代社会在上世纪最后25年中发生了一次结构断裂。在这之前的社会是第一次现代性社会,而由于这次断裂,第一次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科学等基础体制逐步被一种新的体制构成方式所补充和取代,这种新体制就是第二次现代性社会或曰反思的现代性社会。从第一次现代性向第二次现代性的过渡是一种缓慢而渐进的过程,而且第二次现代性必须以第一次现代性的实现(功能完备的国家、工业化、民主和科学的发展等等)为前提。这体现出一种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法,旧有的一切不是被简单地抛弃,而是被补充、被扩展、被重塑。

贝克指出,民族国家正是第一次现代化的基本政治体制,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一种历史形态,它产生于18世纪并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世界政治的普遍形式。民族国家具有五个明显的特征:(1)对内对外拥有无限的主权,这种主权建立在对合法暴力手段的垄断之上;(2)其组织和运作方式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官僚理性;(3)以单一社会文化认同的民族主义作为其规范建构原则;(4)代议制民主的特殊程序;(5)不断扩大的职能清单,其宗旨是尽量确保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免受各种威胁。以上各点综合起来,构成了人们所说的民族国家,即一种能满足一定地域和民族的现实治理需要的规范、体制、统治技巧和程序的历史形态,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功地将现代社会加以整合和一体化,以维护和增进本民族的利益与安全。然而,当世界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时代,民族国家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尤其是政治经济的全球化架空了民族国家的绝对主权,全球性风险也大大超过了它的有限处理能力,民族国家再也不是理想的危机避难所,民族国家陷入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状态。所有这些最终摧毁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特别是领土划分、种族界限、主权的绝对性和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利己主义原则的合法性。随着第二次现代性社会的来临,作为第一次现代性的基础体制的民族国家,已经在反思的现代化的进程中从根本上动摇了。

第二次现代性社会加快了世界的全球化进

程，正是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共同面临的新的巨大风险，使世界主义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贝克指出：“全球化乃是人类遭遇的新命运，是世界正在经历的又一次历史转型。”^① 首先，当代的全球化表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关系上：各国的经济已经突破了本国界限，形成相互间无法分割的联系，资本、原料、能源、人员和商品等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超越民族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各种形式的合资与联营公司蓬勃发展，这种相互依存的紧密联系正在逐步扩大到整个政治和经济领域。其次，全球化还表现在日常生活领域，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事国际性经济活动或在跨国公司工作，与他人恋爱结婚生孩子，在国外生活、旅游、消费，使用多种语言，在异国接受教育，在互联网上进行全球漫游。最后，各种跨民族管理机构以及地域性国家联合体不断产生和发展，而在这种跨民族的世界管理的综合系统中开始显露出第二次现代性社会的基础体制的雏形。这种全球化的结果是，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紧密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风雨同舟的利益共同体。

不仅如此，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还导致了各种风险的全球化，从而使全世界变成一个休戚与共的风险共同体。第一次现代化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数不胜数的潜在的负面后果，当这些负面后果变得明显可见之时，风险社会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贝克将全球风险描述为先进工业化社会的不可避免的结构条件，即各种各样的新风险和“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建构了现代社会。这些风险包括全球经济危机和金融崩溃等经济风险，生态破坏、气候变暖、大气污染、核电站泄漏和臭氧空洞等生态与环境风险，基因工程、纳米技术中潜藏的科技风险，以及核战争、全球恐怖网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对平民的暴力袭击等文明风险和恐怖主义风险，等等。贝克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第二次现代性社会中，这些风险具有跨国家的全球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可弥补性三种特征：（1）去本地化（即全球化）：新的

全球风险的原因和后果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地理位置或空间，也不遵守民族国家的界限或者其他界限，而是在全世界各地无所不在。（2）不可计算性或不可预测性：全球风险大体上是不可计算的和不可预测的。比如各种新风险具有很长的潜伏期（例如核废料），以致人们现在不能确定和防范它们的长期影响。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效果链的长时段，因果关系安排不再可能具有任何程度的可靠性。（3）不可弥补性：一旦全球金融体系崩溃，一旦气候不可逆转地变化，一旦恐怖主义组织拥有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那么一切都不可弥补了。

二、现实主义的世界主义

在贝克看来，当代全球风险的这些新特征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逻辑：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单独解决自身的所有问题，因此对灾难性风险的预期和防范不再是一国的国内事务，而应成为世界风险社会的共同事务。在这个意义上，全球风险的历史性力量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救世主”，唤起了为创制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边界和民族国家自我中心主义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所必需的活力、共识和合法性。于是，风险转化为希望，人们通过对风险及其可怕后果的预感和反思而觉悟到，只有“世界主义”才有可能降低和遏制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风险。换言之，全球风险开启了一个新的道德和政治空间，产生了一种超越各种边界和冲突的、既追求自己的利益又对他者负责的世界主义文化。

贝克特别强调，当代欧洲的世界主义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想主义的演绎，相反，它是一种不纯粹的世界主义现实政治的表达。因此，贝克将其称为现实主义的世界主义。虽然在历史上，世界主义常常带有精英主义和空想主义的意味，然而在今天，现实本身已经开始了世界主义的进程。正是这一点将当代的世界主义与历史上的世界主义区别开来。贝克指出，现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现实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核心论点是：“欧共体或欧盟的成员并非出于理想主义的动机，而是基于自身民族利益的考虑，才放弃了它们拥有的权利，它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它们认识到，只有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即承认别国的合法权益并将其纳入自身利益的算计之中，它们自己的利益才能够实现。唯有如此，它们才能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既达到自身目的，也实现欧洲的目标。具有约束力的合作规范，将创造出一种政治的剩余价值，使国家和欧洲都从中获益。”^① 贝克在另一个地方又说：现实主义的世界主义“允许成员国‘现实地’追求自身的利益，但期待它们同时照顾到他人和共同体的利益。其结果不仅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在一种共赢的意义上，也将带来共同体利益的最大化。”^② 因此贝克强调：世界主义既不是利他主义，也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一种现实主义：驱动跨越边界的行动者联合起来的是全球风险和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哲学家在象牙塔里凭空虚构的乌托邦，因此这种世界主义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行性。

三、差异性一体化原则和有秩序的多元主义

在贝克看来，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差异或“他性”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方式：普世主义、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和世界主义。（1）普世主义是以一种统一的规范取代、消融和同化形形色色的种族和宗教的差异，在承认和确立普适的规范的基础上让他者获得平等权利和同等尊重。不过，普世主义的弊端是对差异和特殊性的抹煞。（2）与普世主义相反，后现代主义从他性的不可通约性出发，对他性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但其弊端是，由于缺少所有人赞同的具有约束力的与他性交往的规范和程序，将他性和差异绝对化，从而导致理论上的极端的相对主义和政治实践上的地方主义及分离主义。（3）民族主义在处理“他性”时遵循的是非此即彼的逻辑，它是依照国界的内与外的区分来操作的：对内，民族主义努

力消灭差异，以便建立民族认同；对外，民族主义则制造并强调差异，拒绝平等对待其他民族，把他者贬低为从属的、低等的、不享有同等权利的野蛮人。民族主义是与他性交往的典型的前现代方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征，他顽固地将不同的文明纳入一种等级化的支配—从属关系之中，重复着殖民主义的错误。（4）世界主义与前面的所有方式都不同：前三者都遵循非此即彼的逻辑（封闭的二元性），而世界主义则坚持亦此亦彼的逻辑（包容的二元性）。在思维、共同生活和行为中承认他性，已经成为世界主义的最高准则——不仅对内，而且对外。贝克写道：世界主义“将他者既作为与己相异，又作为完全平等的人来对待。……陌生者不是被作为威胁、分裂、颠覆的力量被排斥，而是作为补充和丰富的因素被正面评价。”^③ 另一方面，这种将他者视为既平等又相异的伙伴来对待的原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世界主义承认他性，但并不将其绝对化，在充分考虑到当今世界的民族趋同倾向的前提下，寻找一条使差异得到普遍容忍的途径，努力寻找一些所有人都能接受和共同遵守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因此，世界主义要求一种新的一体化方式，一种新的认同概念，这种新的方式和概念使一种跨越界限的共同生活变得可能。贝克写道：“一个世界主义的欧洲，首先是一个承认和包容差异的欧洲。……与此同时，欧洲的世界主义也必须对差异进行限制和调节。因此，一个世界主义的欧洲，不但是一个存在差异的欧洲，而且是一个一体化的欧洲。”^④

贝克特别阐述了这种新的世界主义的一体化思想，其核心原则是“差异性一体化”原则。^⑤ 这一原则摒弃了将“相同一致”看作“团结统一”的必要条件的旧式一体化思路，认为差异和多样性不仅不是为了达到团结统一而必须消除的干扰因素，恰恰相反，应该被看作值得保存和利用的宝贵资源。差异性一体化原则要求一方面是对差

①②③④⑤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主义的欧洲：第二次现代性的社会与政治》，章国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83、18、19、308页。

异的认可，另一方面是不同方面的一体化。具体做法是，在欧洲的各种一体化方案的实施过程中，要兼顾保护差异和推进一体化两个方面的要求，采取各种措施灵活掌握这两种因素的强弱程度和相互比例，通过各国对别国的调控政策的相互承认和在共同体层面上公开协调的方法，以及某些政策和规则根据各国的意愿适用于部分国家的地域差异化的方法，构建一种灵活兼顾差异和一体化的“有秩序的多元主义”社会。^①

显然，世界主义的欧洲所创造的这种一体化方式与以往不同，它既不是使欧洲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把民族特性看作欧洲统一的障碍，也不是将民族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欧洲之上，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抱着怀疑和戒备的态度。世界主义的欧洲不但不是民族国家的对立面，而且必须以后者为前提，这里适用的仍然是亦此亦彼的原则。世界主义不是要消灭民族国家，而是对民族国家既超越又保留，从内部将民族国家世界主义化，并以不同方式将其纳入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以及跨民族共同体和区域性机构，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世界治理的综合系统。

贝克以欧洲联合的历史经验为依据，阐述了这种新型的世界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从历史的角度说，欧洲的联合是在两次世界大战、集中营和大屠杀、各种极权主义统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通过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和互相残杀的战争的灾难性后果的反思，通过对非此即彼的排他立场——我们或他们、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西方或伊斯兰——的摒弃，欧洲实现了与战争历史的决裂和民族之间的和解，最终从多民族分治中走了出来，开始了民族融合、文化杂交和内部开放的文明进程，努力构建一个没有敌人、没有战争、政教分离、丰富多彩的自由而人道的欧洲。贝克写道，欧盟的组成恰恰不是通过军事征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是通过自愿和共识，在民族交融以及从中产生的政治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完成的。今天的欧盟应当被视为一个非中心的、领土可变的、将民族国家与跨民族机构整合在一起的跨民族的协商系统，这就是世界主义欧洲的政治体制的核心。^②

贝克继而阐述了世界主义的欧洲联合体在体制上的一系列具体特征，其中较为重要的特征包括：欧洲的民族国家根据各自状况的不同，不享有同等的权利，也不承担相同的义务，形成一种非对称的统治秩序；联合的欧洲具有开放的、可变的、空间结构；它具有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社会结构，拒绝用单一的文化同化其他文化，保障各种族、民族、宗教、政治身份和文化之间的共存；它是通过法律、共识与合作而达成的一体化，在处理内部事务时禁止使用武力；它更加有效地解决了社会安全和生活福利的问题，通过将战争工业置于跨民族的共同监督之下下来避免再次发生战争的危险，通过开辟更大的市场并将内部经济竞争置于统一的规则之下下来提高福利；同时实行横向和纵向的体制一体化，形成一种网络式结构；统治权力发生了双重转换，命令权向谈判权转换，集中的等级权力向网络权力转换，消解了传统的中心—边缘关系；民族国家的绝对主权转变为综合的世界主义的主权；等等。这些体制特征将世界主义的欧洲与传统的帝国明确区分开来。

四、传统民族国家的转型

在联合的欧洲的体制中，传统的民族国家必须实现一种重大的转型。贝克指出，面对欧洲联合的世界主义潮流，民族国家必须用世界主义的眼光，既从民族的又从欧洲的角度来审视自身的利益。惟有如此，民族的福利才能同欧洲的福利融为一体，在不放弃民族国家的前提下，通过内在的转型，将独立的民族国家转变为自我约束的世界主义国家。民族国家必须摒弃由博丹和霍布斯提出的古典的绝对主权观念，抛弃国家和世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才能通过放弃民族国家的主权而获得世界主义的主权。

在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关于合作共赢的

①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主义的欧洲：第二次现代性的社会与政治》，章国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② 参见《世界主义的欧洲：第二次现代性的社会与政治》，第48、72、73页。

博弈论思想^①的启发下,贝克指出,在这个超民族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和全球性风险的时代,惟有奉行一种自觉的“黄金手铐政策”,即理性的自我约束政策,才能在使他人和共同体受益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将零和博弈的恶性循环转化为多方共赢的良性循环。在世界化的过程中,参与国的民族主权其本质核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民族国家转变为超民族国家。只有将民族利益在体制上和事实上超民族化,才能形成一种成员国自我约束并自觉限制其民族利益的反思的战略,为的是长久地、最大限度地维护它们的民族利益,确切地说,这种民族利益是一种超民族国家的反思的民族利益。这种反思的民族利益是民族利益在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内部世界主义化:首先是在欧盟内部,所有成员国都获得了扩大其权限的机会。它们在欧盟内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可以对欧洲政策及其所带来的(超)民族后果直接施加影响;还可以利用欧盟集中起来的力量,解决自己内部的民族问题,如犯罪问题、移民问题、环境问题、农业发展和科技合作等问题。其次是互动的压力和控制。在欧洲的权力空间中,单独的国家利益受到了纪律的约束,并被置于跨国依赖关系网络的相互依存关系之中,处于互动的压力和协商制度的监督控制之下,因此一国的消极态度或自私行为会招致伙伴国的纠正和遏制。最后是必须转变关于民族优先权的旧有观念,抑制民族情感,使其向世界主义的共通感转化。在联合的欧洲内,民族优先权不再是不言而喻的和无条件的,而是相互的和有条件的。“国家利益必须通过国家手段来实现”,这一以国家为基础的现实政治格言必须为世界主义的现实政治格言所取代:“我们的政治结构和活动愈是世界主义化,它们将愈是成功地增进国家利益,我们个体在全球时代的力量也将愈大。”贝克认为,以上三种机制也就是民族国家自我约束即“黄金手铐政策”的三种内涵,它们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为打破民族零和博弈的恶性循环,并用超民族共赢的游戏来取代它,从而实现世界主义的欧洲创造了条件。

贝克强调,为实现世界主义的全球性相互依

存社会,不仅需要每个民族国家自身实行理性的自我约束,同时还应该对其他国家加以约束,这两方面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只有如此,才能排除大国霸权的干扰,在各国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平等的相互依存关系。为了启动信任资本的积累,首先必须保证所有参与国的相互性,即共同参与决策过程,每项决定都必须获得一致赞同方才有效;同时在采取行动时必须考虑他者的立场,既要照顾大国和强国的利益,也要满足小国和穷国的需要。为了建立平等的相互依存关系,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相互依存关系的条件、程序和结果被参与国和国际社会认为是平衡的和公正的而加以接受;民族霸权行径和干涉行为得到有效的遏止,或至少其后果通过和解政策而得到消除和平衡;建立起一种纠正和监督机制以及体制性保障,从而使不对等的依附关系得到遏止和纠正。总之,通过民族国家的理性自我约束和对他的约束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才能使人们在面对世界风险社会中文明自我毁灭的危险时,超越民族界限和文化差异,建设一个平等的世界主义的全球性的相互依存社会。

五、世界主义的发展方向

在此基础上,贝克阐述了现实主义的世界主义对实现全球社会治理的思想启发和实践意义。他首先指出,世界主义让我们看到,世界风险社会的现实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逻辑: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单独处理自身的所有问题,所以民族国家不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单位,谁若继续打民族这张牌,谁就会失败。其次,世界性问题创造着跨民族的共同性,相互依存不是人类的祸害,而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合作不再是一种手段,而变成了目的。全球性越是自觉,越是得到承认,所包容的文化、国家、政府、区域和宗教越多,单边主义就越没有市

^①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密执安大学教授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曾通过两次全球性的计算机模拟竞赛证明了,强调合作共赢的生存策略(设计者为阿纳托尔·拉波波特)具有超越以欺骗和损害他人作为特征的生存策略的明显优势。

场，因为有效性与合法性只能来自于国家间的合作。再次，国际组织不仅是国家政治的继续，而且它们还重新塑造国家利益。它们使参与国之间的权力博弈变成一种多方共赢的游戏，以取代民族独立的零和游戏。它们把国家利益转化、扩展并最大化为跨民族利益，同时也为国家开启了跨民族的权力空间和创造空间，并由此创造出世界主义的剩余价值，最终不仅使大家都从中获益，而且使世界性问题（同时也是民族问题）在扩展了的民族空间内得到遏止和解决。最后，欧盟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于应对全球风险的政策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全球性风险政策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军事实力与符合程序的世界共识之间的权力平衡之上。没有获得国际组织授权的单边主义行动不仅没有合法性而且也是不经济的，单一国家自行其是的跨国政治行动终究难以成功。

两年多前，乌尔里希·贝克曾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了一场题为“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时刻’”的演讲。他把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称为“世界主义的时刻”，其含义是指，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可以成为推进国际社会向世界主义转变的机遇或契机。

在这场演讲中，贝克除了重申他的一些主要理论观点之外，还特别谈到了几个重要问题。

首先是关于敌友区分的问题。他说，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跨国甚至全球的紧急状态已经使卡尔·施密特在其主权理论中所设定的界限分明的朋友和敌人的区分变得模糊起来，因为当代的全球风险衍生于西方国家内部，甚至源于极端自由市场经济（金融危机）和工业化（气候变化）的中心。现代化早期关于异己的他者存在于遥远的外国的假定已经不再适用，全球风险破除了国家边界，将本国人和外国人混同在一起，远处的他者正在变成包容性的他者。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了一个共享的全球威胁空间，却没有安全出口。战争与和平的逻辑在整个历史中都是有效的，但是在“世界主义时刻”却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战胜不再是胜利，战败不再是失败，作战各方必须创制出新制度，以使在自我灭绝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继续生存、思考和论辩成为可能。

其次是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的问题。他说，当前的全球金融灾难表明：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破坏了它自己的先决条件。它告诉我们，市场并不是——经济学家们制造出来并使我们相信的——所有问题的答案，而是对我们生存的一种威胁。我们从这场危机得到的教训是：与新自由主义关系密切的自由放任的市场资本主义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没有任何位置，现代性亟需反思性的市场规则，另一种替代性的现代性是可能的！

最后，贝克展望了未来世界主义的发展方向，以及在加强国际合作、实现世界治理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他指出，一种新的、在眼下已经发挥作用并超越了国内—国际这一区分的全球政治已经发展成为一场元权力博弈，而这场博弈的结果完全是开放性的。在这场博弈中，各种界限、基本规则和基本区分都需要重新谈判——这些界限、规则和区分不仅存在于国内和国际领域，而且存在于全球商业、国家和超国家组织和正在崛起的中国、印度、南美、美国和欧盟等权力机构之中。单一的竞争者或敌对者都不能依靠它自己就赢得这场博弈，所有的博弈者都依赖于联盟的力量。不仅如此，还亟需一种建立在政党之间、国家之间、宗教之间、朋友和敌人之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就解决各种全球风险和冲突问题进行谈判的国际宪法——这是生存的前提。这就是贝克教授给全人类提出的忠告和建议。

六、世界主义理论的缺陷

贝克的世界主义虽然对当代国际关系发展前景进行了构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下实际的某种现实性，尤其对于近代以来分裂为众多中小型民族国家的欧洲来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它们谋求联合、共图发展、共同应对全球危机的时代需要。然而，贝克的世界主义理论的可行性仍然面临实践的严峻考验或者缺乏现实性，尽管欧洲采取了很多措施，甚至制定了有关贸易、文化等促进欧洲一体化的方案，但具体效果并不理想。这说明贝克的世界主义

还有许多缺陷。首先,无法提供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药方。当前在欧洲发生并不断蔓延的主权债务危机对欧盟的经济联合能否持续以及欧元区是否会破裂提出了严重挑战,像希腊、西班牙等相对落后国家与德、法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如何缩小?两类国家如何继续在同一经济体内共存共荣?这种经济差距是否会造成发达国家与相对落后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分工?以至这种分工会不会造成国家之间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和永久化?在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的压力下,欧盟和欧元区能否避免最终破裂?对于这些未知数,贝克的理论并没有提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良方甚或一剂缓解问题的药方。最近,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愈来愈强,说明贝克的理论已经受到了直接挑战。其次,面对某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超级大国以及顽固坚持狭隘民族主义的极端分子,贝克的理论也很难说服它(他)们充分理解全球危机的广泛性和紧迫性,从而放弃一意孤行的霸权主义,接受世界主义的各项原则,采取

积极措施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国家和多元文化的平等联合与共同发展。尽管全球面临了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共同问题,但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全世界也很难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完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也是贝克的世界主义没有看到或者有意回避的问题。最后,贝克的世界主义没有考虑到国家主权、民族、宗教、文化等的不可通融性和差异性、复杂性,希冀通过消弭差别来求得“差异性一体化”,是无法实现的,当前围绕领土、主权、资源等发生的地区冲突依然存在着,将来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所以,“差异性一体化”也可能是美好的愿望或镜中花、水中月。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周勤勤

Integration while Retaining Differences and Ordered Pluralism

—On Ulrich Beck's Theory of Cosmopolitanism

Yang Shen

Abstract: Ulrich Beck, contemporary socialist in Germany, expounds the theory about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world risk society”, and “cosmopolitanism”. Beck points out that together with the complementation and replacement of the fundamental system of the first modern society by the second or reflexive modern society, all states and nations in the world have not only form an interest community, but also become a risk communit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strengthened mutual dependence of all countries and the coming global risk society make cosmopolitanism a historical necessity. Beck advocates that cosmopolitanism should carry out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on while retaining differences” whe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differences and “otherness” between various states and nations. The goal of cosmopolitanism is to construct an “ordered pluralistic” society which takes both difference and integration into account.

Beck proposes that it is urgent to reach some consensus among parties, countries, religions, friends and enemies, on the foundation of which to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 in order to negotiate for resolving global risks and conflicts. This is the premise for mankind to survive.

Key words: cosmopolitanism; integration while retaining differences; ordered pluralism;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